

《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内涵重探

唐雯

随着女主时代的结束,《升仙太子碑》的政治表达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最终被遗忘和误读。然而透过其漫长而复杂的生成史,我们或许可以拨开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在探究其真正政治内涵的同时,感知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不可一世表相下幽微的内心世界。

伫立于今河南偃师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碑》,是唐代著名碑刻之一,其碑文号称武后亲自撰文,因而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自《金石录》始,历代著录、题跋、考订颇多,至王昶《金石萃编》会最群言,总其大成。至于此碑主旨,自《朝野僉载》将王子晋与张易之联系起来之后,以《金石录》为代表的历代考证者多以为此碑系为张易之而作,然而现代学者则倾向于将此碑与当时政治形势相联系,颇具启发意义。事实上,除了碑文的本身,《升仙太子碑》的碑阴还包含了武后和中宗两个时代所镌刻的内容,这提示着我们,这座大碑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成史,而其后或许包蕴着更为深邃的历史内涵。

《升仙太子碑》不同寻常的生长史

《升仙太子碑》连颺屭及蟠龙首,通高6.54米,碑阳是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碑文,文末刻有“圣历二年(699)岁次己亥六月甲戌十九日壬寅”的建碑时间,而其碑阴按照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碑额所镌武后御制《杂言游仙篇》,题“奉宸大夫薛曜书”。第二部分位于碑身上段偏左,系以武三思为首的宰相题名,分别为“春官尚书检校内史监

修国史上柱国梁王臣三思;光禄大夫行内史上柱国臣王及善;中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臣苏味道;朝散大夫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臣魏元忠;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汝阳县开国男臣狄仁杰;银青光禄大夫守纳言上柱国谯县开国子臣娄师德;银青光禄大夫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郑县开国子臣杨再思;朝请大夫守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左控鹤内供奉臣吉珣”。第三部分位于碑身正中,仅两行,第一行被完全凿去,第二行则被凿去勒碑使姓名,存“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二十一字。第四部分紧贴碑身最右,贯通上下,系造碑各项

具体事宜责任人题名,分别为“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已下名臣薛稷书;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峻;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题□□等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臣卓勒□;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以上四部分天、国、人、臣等皆用武后新字。第五部分位于碑下部偏左,为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相王李旦及其僚佐题名。

碑阴神龙二年的纪年和人 为铲凿的痕迹,使《升仙太子碑》的成立过程变得扑朔迷离。围绕此碑的讨论,大致可以概

括为这样三个问题:一、立碑时间是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还是神龙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二、碑阴中间被凿去勒碑使姓名及其左面一行文字为何?三、碑阴右侧上部的磨痕之下是否存在过所谓“诸王等名”,如非诸王题名,则钟绍京所书“题□□等名”究竟为何?

我们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勒碑使姓名在碑阴正中,距离第二部分的宰臣题名较远,似乎并不是诸臣题名中的一位,而所谓“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不通,前当有“奉”字,同样的用例见诸于《金石萃编》所载裴光庭碑,其碑末即有“奉敕

(下转 11 版) ➡

➡ (上接 9 版)

还在赤石与吴人作战,大概在此后不久,彭城才西入湖南。马殷任命彭城为溪州刺史,铜柱铭文中的彭士愁便是彭城之子。父子两代担任溪州军政长官,故而铭文中说“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彭氏得到马楚政权溪州刺史的任命,获得了将根基从江西庐陵迁到湘西溪州的契机。何以只是契机?因为此时溪州还是一个马楚政权未能深入统治的地区。这里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马楚政权的来历,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陷入“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乱局。原属秦宗权淮西蔡州集团的一支军队,先后转战淮南、江南,在强敌逼迫下流入江西,再越过罗霄山脉进入湖南,不意外地轻易兼并了湖南境内的主要藩镇潭州武安军。转战之中,这支军队的主将孙儒、刘建锋先后死亡,第三号人物马殷最终完成了对湖南七州和广西北部五州的征服,并向行将灭亡的唐朝称臣,被任命为武安军节度使。朱温代唐,第一时间加封马殷为楚王,马楚政权就此在湖南建立起来。对湖南来说,马楚也是一支外来势力。在开拓五溪或羁縻溪州诸蛮方面,马氏与彭氏拥有共同利益,是具有联姻关系的君臣加盟友。尽管在天福四年至五年双

方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但在彭士愁遣子师曷请降之后,马楚方面立即同意,且给予彭氏及溪州更高的优待。此即铜柱铭文所说:“王……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廩粟,大赉贫民。”溪州之战,其实是马楚、彭氏与溪州“五姓”三方参与的一场博弈。马楚政权在军事获胜的威势下,得到了溪州的宣誓效忠,并且“迁州城下于平岸”,并以刘勅为锦州刺史,安定了这片与后蜀相邻的中间地带;彭氏则强化了对溪州的统治,其经济、军事上的独立性亦得到马楚的正式承认,彭氏在战败的情况下成为政治上最大的赢家;“五姓”所代表的溪州旧蛮酋的权力和官职被进一步剥夺,且以立誓的形式确定了对马楚与彭氏的效忠关系。以“誓”为基础确立的效忠关系,在此后发展为誓下州与都督主的体制,彭氏世为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统领誓下十九州。作为二十州政治关系枢纽的“誓”,即为铜柱上所刻之“誓”,或者是以此为基础有所增补、多次以仪式确认的誓。铜柱成为五溪地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物,如同中原王朝的“九鼎”或“玉玺”,在宋代也经历了多次争夺和迁徙,并被保护至今。铜柱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象

征物,除了其上刻有与马楚政权盟誓的文本,其神圣性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物质性,即它是以“铜五千斤”铸成的。在以铜为货币原料的时代,铜五千斤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湖南有郴州等地的铜冶,马殷初据湖南,尝铸“天策府宝”铜钱,铜质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然而十余年后,“又自铸铅铁钱,凡天下商贾所赍宝货入其境者,祇以土产铅铁博易之无余,遂致一方富盛,穷极奢侈”。此后马楚主要行用铅铁钱,说明铜被视为珍贵财富,为官府汲汲聚敛之物。那么马希范何以一掷千金,用铜铸柱树立在遥远且半独立的溪州?史无明言,只能做一点推测:溪州铜柱所用之铜,应大部分来自溪州之战中的缴获以及五溪蛮酋的进贡,其主要载体或为铜鼓。湘西地区虽非铜鼓发源地,然自南朝以来,屡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如陈朝华皎为湘州刺史,“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可知南朝后期湘西川洞之中已多有铜鼓。《宋史》记载了乾德四年(966)南州(誓下十九州之一)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亦以铜鼓等来贡的事件。此例可说明铜鼓在内附和进贡中的作用,其时上距天福五年仅 26 年。《宋史》还说“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可知铜鼓为溪

峒夷獠日常与祭祀活动中必备之物,其数量一定不少。南宋朱辅《溪蛮丛笑》还说:“蛮地多古铜……麻阳有铜鼓,盖江水中掘得,如大钟,长筭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今人天庆观。”以此估算,五千斤铜不过数十具铜鼓而已,以溪州之战涉及的地域之广,战中与战后获致数十铜鼓并非难事。《溪蛮丛笑》还记载:“山獠婚娶,聘物以铜与盐。”铜鼓之外的铜器与铜料也作为贵重物在五溪地区广泛存在。根据以上推理,溪州铜柱的铜料极有可能主要来自五溪蛮人之中。将收缴或纳贡得到的铜鼓转换为其他形式的铜器,也是马援的著名事迹之一,“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后汉书》)。这一故事马希范想必熟悉,传说中的马援铜柱如果存在,也一定是取材于骆越既有的铜料,主要是铜鼓。将铜鼓改铸成铜马或铜柱,不仅仅是就地取材的便利做法,还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隋书》云岭南俚獠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有战斗时则鸣鼓集众。铜鼓不仅是财富标志,更是蛮獠酋首在政治、军事和祭祀方面的权力象征。明万历初征四川都掌蛮:“克寨

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得诸葛铜鼓九十三……(蛮酋)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明史》) 此段借蛮酋阿大之口,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铜鼓在蛮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虽时代地域有别,亦不妨作为理解湘西蛮人与铜鼓关系的一重参照。象征蛮酋权力的铜鼓被收缴或献出,被改铸为标榜王朝功德的铜柱,并刻上效忠楚王和溪州静边都彭氏的誓文,这不啻为对五溪政治结构变动的一种明白宣示。溪州彭氏是铜柱树立的最大受益者。在以盟誓结束溪州之战约半年之后,请求马楚政权树立铜柱铭刻誓文,甚至还可能协调溪州诸姓为此贡献铜鼓和铜料的“溪之将佐”,正是彭士愁为首的彭氏集团。铜柱上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尤其是彭氏权益的誓文,呈现出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记颂的有效期相当短暂,因为马楚政权只存在了 56 年;誓文则影响深远,不仅直接造就了宋代的誓下州体制,还保障了彭氏的地位,而彭氏作为湘西永顺土司,统治一直维持到了清雍正七年(1729)。(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